



美国应当摒弃全球意识形态斗争

帕特里克·波特、苏曼特拉·迈特拉¹

编者按：拜登上台以来，一种主张在全球推进民主、重建“开放的世界”的观点在美国兴起。本期推荐的文章对这种观点做了剖析和批判，指出以“政权类型”划界，在全球展开意识形态斗争，其实质是以民主之名追求武装霸权。如果付诸实践，不仅会导致冲突升级，还会迫使竞争对手联合起来对抗美国，并让盟友疏远美国。

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应走向何方？当前，自由国际主义再次浮现，主张重建“开放的世界”（an open world）。然而，以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斗争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将把世界拖进战争泥淖。

在美国思想界，这种新的“冷战自由主义”把矛头指向全球威权主义，以“政权类型”作为界定美国国家利益的标尺，认为美国最主要的安全问题是民主的缺失及其受到的阻碍，而解药是推动民主发展。这种福音传教主义的观点可能会指导后特朗普时代民主党总统的外交政策。对拜登而言，美国必须重新“领导”。他曾说：“民主和自由主义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和威权统治，并创造了一个自由的世界。这种竞争不仅定义了我们的过去，还将定义我们的未来。”

类似的是，在学术界和大众文化中也有人呼吁应在民主和威权之间重新开展竞争。即使在多极世界里，他们依然坚持美国的特殊地位，拒绝将美国的失败归咎于例外主义，反而认为美国的失败缘于对例外主义的背离，呼吁重新关注国外政权的性质。

¹ 帕特里克·波特（Patrick Porter）是伯明翰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教授及伦敦皇家联合服务学院的高级助理研究员；苏曼特拉·迈特拉（Sumantra Maitra）是伯明翰大学博士及詹姆斯·马丁中心的助理研究员。本文英文原文发表于《国家利益》网站：<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should-reject-fighting-global-authoritarianism-179278>，此为中文摘译版。

瑞贝卡·利斯纳(Rebecca Lissner)和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对美国治国方略的全新构想是上述观点最充分的表述。她们认为美国新政府必须推行变革性的政策,以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

这一“开放的世界”战略有许多面向,其中三个目标最为突出。第一,美国在承认中国经济增长和世界多极化的同时,必须继续致力于防止和抵制“任何建立不受外部商业、军事或外交监督、具有绝对主导权的领土或科技诉求”。美国必须确保全球贸易和商业的自由流动以及开放的海上通道,并阻止中国建立势力范围。第二,美国应当反对崛起中的威权大国。通过和民主国家结盟,带头建立一个鼓励民主的、开放且多元的信息环境。这样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保护美国免遭网络攻击和恶意影响。第三,美国应致力于“扩大在亚洲和欧洲的现有联盟”,形成反对网络侵略的统一战线。

不幸的是,虽然目标是崇高的,但作为干涉主义的新版本,她们的政策主张有根深蒂固的缺陷。首先,它将“开放的世界”与使世界“开放”的过程混为一谈。尽管从理论上说,一个由同美国关系良好的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将会更加和平,但历史表明,达到这一结果的安全竞赛以及革命进程极不稳定,且容易诱发战争。当一个民主的超级大国认为自己不能再忍受某些非民主国家,允许自己频繁诉诸武力,认定自己是和平的捍卫者时,情况很容易升级。民主国家对世界和平的愿景常常陷入使全世界民主化的误区。

“开放的世界”主义不能有效地区分领域、地区和利益的优先次序,还常常刺激大国竞争中的对手们联手对抗美国,也难以有效处理变得日益威权的盟友。这种世界观认为,美国的安全利益遍及各地,容易导致帝国的过度扩张以及意识形态竞争,同时很可能被视为大国的傲慢和危险的升级。不论其本意如何,对手都会合理地认为自己的政权受到威胁,并采取相应行动。把有着不同目标的不同对手一概视为“威权主义”国家,将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那些美国认为仅仅是展示自己决心的行为将促使不同的对手联合起来。

“美国领导下的开放”实际上意味着霸权统治下有选择性的开放。利斯纳和霍伯提出,美国应当有选择地使用经济制裁,这是封闭,而非开放。这种“开放”不允许其他大国在“美国的后院”结盟或驻军。她们指出,美国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主宰对手,但应反对威权大国将势力扩张到其领土之外。在这种语境下,反霸权与霸权无异,所追求的还是美国的主导。

认定美国的繁荣与安全建立在世界的“开放”之上并不符合历史。在美国作为共和国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不开放”的。美国尽管在口头上承诺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但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常常与行径残酷的国家结盟。因此，“开放的世界”存在与否并非美国地缘政治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当美国作为一个不安分的传教士或经济全球化的狂热支持者时，“开放的世界”主义弊大于利——由于帝国的过度负担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其他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的地位不断下降。

“开放的世界”主义者承认，中国的崛起加上美国国内体系的功能失调造成了当下的国际政治现实，世界已不可能回到往昔。而美国的政策正是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中国在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下崛起，美国国内的失调更是直接与其政策相关——无止境的外部战争导致不计其数的暴力和财产损失、数万亿美元的债务、经济金融化、工作外流以及政治与公共生活粗俗化。以民主之名在世界各地追求武装霸权已经威胁到美国自身的利益。

这种世界观最大的缺点之一是不能有效地划定不同地区的优先级，并构建相应的承诺。如果不能区分利益攸关的地区与更边缘的地区，就意味着美国将开展一场支持民主的全球“十字军东征”，需要同时有效地遏制、对抗和打击俄罗斯、伊朗、朝鲜、中国和委内瑞拉等国。这也意味着美国要么挑起土耳其、印度等民主但不自由的盟友对美国的敌意，从而加重自身的负担，要么容忍它们，并因此接受对美国伪善的指责。这种观念将把美国的安全和世界各地的的问题牵扯到一起，在任何角落的任何一场冲突中，美国都应该使用外交、军事和经济力量进行干预。每一场战争都成了美国的必争之地和帝国扩张的必经之路。而且，在这个“开放的世界”里，美国还将同时肩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后新冠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和国内重建的重任。

该学说还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美国有能力根据其政治意愿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但历史证明，大国常常被结构性因素束缚。虽然“开放的世界”主义热衷于强调盟友的重要性，但如果美国的盟友希望选择一条独立的道路呢？美国要么会使用贿赂或胁迫的手段来阻止这些行为，要么放任它们，接受美国主导地位的衰落。如果北约成员国同意按照美国的意愿增加国防开支，那么它们的立场将更加强硬，迫使美国不得不在霸权主导和负担分摊之间权衡。未来，美国也许不得不选择同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共存，以便优先应对中国。

主张“开放的世界”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正面临一场全球性的意识形态斗争。其明显的一个缺陷是，美国的许多盟友和伙伴都是威权主义国家，其中一些甚至侵犯了美国的安全利益。此外，如果美国将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作为首要任务，又围绕民主化改革和人权问题设计自己的政策，那么美国恐怕难以让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快速工业化国家做出实质性让步。拥有不自由盟友并非错误或不明智的选择。历史上，美国曾和在意识形态上令人反感的国家接触，与不同政权类型的国家结盟，获得了惊人的成功。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开放的世界”里，美国应当如何胁迫或惩罚盟友？结盟应当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美国的同盟关系实际上暗含威胁，即美国可以惩罚或抛弃顽固的伙伴。就在最近，国内日益独裁的北约盟友土耳其暗中资助叙利亚的伊斯兰叛军，利用移民问题胁迫欧洲国家，使用俄罗斯提供的导弹防御系统锁定希腊的战斗机。美国应该作何反应？目前，美国已经限制土耳其参与联合打击战斗机计划。然而，美国面临明显的两难局面——如果美国选择容忍土耳其的行为，就将激怒其他盟友，并鼓励土耳其破坏稳定的行为，但更严厉的惩罚措施可能会把土耳其进一步推向俄罗斯。控制盟友的唯一可信途径是严厉的物质惩罚或威胁放弃同盟关系。但这是封闭，而非开放。

对“政权类型”的执念还带来了某种乐观主义，即或明或暗地认定，只要能保持足够的意志，并对政治理念有足够的信心，就一定能在竞争中获胜。但从历史上看，民主国家或共和制国家并不一定获胜。尽管中美竞争的结果尚无定论，但如果美国不断把新的冲突和自己造成的问题列入竞争清单，就将导致更危险的情况。

所有这些都表明，具有误导性的、反应过度的自由主义无法长期指导后特朗普时代的外交政策。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应当追求“开放的世界”，而在于如何以及以何种代价使美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现实。可以预期，对这一理论的追求将引起反抗和冲突，并加剧美国的两极分化。无论托马斯·潘恩“创造新世界”的语言多么吸引人，追求仁爱的武装霸权依然会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

（陈泽均摘译，归泳涛校）